

21.13

南川文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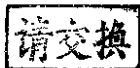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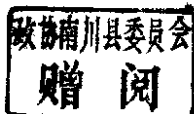
第二輯

政协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南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y+178/25



政协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锦官城外埋忠骨

——纪念张鸿沉烈士殉难五十五周年……张放禹（1）

从五角红星所想到的……………韦德厚（12）

回忆我的父亲韦奚成……………韦昭懿（17）

革命者·诗人·音乐家

——古承铎烈士生平忆述……………曹寄依（22）

附古承铎烈士手迹

迎接南川解放……………李学诗遗稿
肖一进整理（39）

龙岩城抗蒙纪功碑初探……………张远东（52）

蒋介石来南川“训话”纪略……………张承佐（64）

汤子模其人……………章楚翹（67）

南川民众自卫队始末……………梁隆宇整理（75）

锦官城外埋忠骨

——纪念张鸿沉烈士殉难五十五周年

张 放 禹

“曾经沧海身犹在，何处青山骨可埋？”

这两句诗是革命烈士、我的四哥张鸿沉一九二六年从日本回国途中在海轮上的题句。鸿沉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一九三〇年在成都同梁伯龙一起主办西南大学时，被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杀害，时年仅二十六岁。忠骨埋在成都西郊。

鸿沉烈士离开我们已五十五年了。我作为他的亲弟和他亲手培育的西南大学学生，是知道他被杀害经过的见证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追述他的生平事迹，作为对他殉难五十五周年的纪念。

我家住在南川县大观镇。父亲张树之是清末最后一次科考考取的秀才，知名的教育家。早年他曾在湖北宜昌川汉铁路公司担任会计，中年返乡办学。父亲薄有田产，家道小康，可是他素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提倡妇女天足和婚姻自由，崇尚新学，重教轻财。在当时社会风气闭塞、文化落后的情况下，他不是积钱买田产当绅粮，而是倾家送子女上学读书。除我的大哥早丧外，二哥鹏程被送到成都甲种工业专门学校。三哥云程被送到重庆读中学，四哥鸿程（后改鸿沉）被送到天津南开中学，六哥途程被送入杭州军事学校，五姐

淑宜和我（八弟）后入成都西南大学。父亲这种不惜资财栽培子弟的作法，一方面在南川当时社会流俗中颇遭非议，另一方面对当时社会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

鸿沉生于一九〇四年元月四日，从小聪颖好学，素有大志。一九一九年，他在南川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父亲就送他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南川这个偏僻小县还没有中学，读中学得去重庆，读大学得去成都或到外省大城市，富家子弟一般都是读完县立高等小学为止，送到省外读书的，确是屈指可数的了。鸿沉在天津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高潮时期，他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校外活动。一次在向天津督军署请愿的示威游行中，险些被军警开枪打中。他在天津读书期间，只回过家一次。记得那年我刚在大观镇禹王庙县立第四高等小学读一年级，他给我带回一些文具（透明的绿色塑料三角板、钢笔、墨水和精致的笔记本）和儿童读物，在我这个偏僻山乡的孩童心目中，都是一些从未见过的“奇珍异宝”，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一九二三年，我家大观镇下场的街房失火被焚，父亲带着全家迁往南川县城西外罗家洋房居住。鸿沉就是那年在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工业大学。

一九二五年，鸿沉在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并在该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大学时，成绩优良，屡受嘉奖。他不但擅书法，工诗词，而且长于英、日两门外语。他的英语发音准确，清晰流利，能同英美人士直接交谈。在我原有的鸿沉遗物中，有四本《孤鸿随笔》手稿，是用当时北京精刻的中式直行线装笔记本，记录了他在北京工大三年间的学习心得和生活情况，采用文言记叙，间有诗词曲赋，词藻清丽，不落俗套。在我们兄弟姐妹中，他的才华和文化知识水平算是最

高的了。

鸿沉大学毕业后，回家探亲，在南川西城外和汪石翼、曾庆华等组织成立“青年社”。他们经常在一起进行开会、演讲等活动，把革命的种子撒在家乡。同时又创办了南川女子职业学校。

民国十幾年，南川风气未开，古训“女子无才便是德”还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县里只有一所县立女子小学校（校址在县城后街）。女子能到重庆等外地升学的极少，从事社会职业的更是寥如晨星。鸿沉他们为了开展妇女运动，谋求妇女经济独立，创办了南川女子职业学校。为了破除封建传统观念，号召女生入学，他首先动员自己家中的青年妇女入学，将五姐淑宜，四嫂刘氏，因没有名字，鸿沉临时给她取名刘竹如，三嫂袁氏，取名袁琴君，连二嫂遗下侄儿小萍的保姆杨氏，也给她取名杨评梅，都一起送去上女职校。职校开始即有二三十人上课，可惜，鸿沉回北京去后，不久就解散了。

在这以后，鸿沉又回过家一次。那时，我家已迁到县城西街“太原支祠”居住，那是一所封建世家遗留下来的旧式庭院。鸿沉回来没有住多久又走了，留下的纪念是在前厅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其中有八十高龄的老祖母及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侄儿等二十余人，这是我家有鸿沉参加的最后一次全家合影了。

鸿沉从北京工大毕业后到武汉工作以前两年多这段时间内（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根据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家书、照片等实物资料以及父兄们的追忆，他大约有三四个活动地区，即到奉海铁路任职、东渡日本、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参加北伐。

鸿沉在北京工业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被聘到奉海铁路（今辽宁沈阳至海城段）任职。在铁路上没干多久，他就到日本去了。他从日本寄回的几张照片，我都珍藏在贴相簿上。他一九二六年从日本回国途中在海轮上作了一首七言律诗，并将诗中一联对句“曾经沧海身犹在，何处青山骨可埋？”用行书写成横幅。回国后，他到广州工作，主持过“四川革命同志招待委员会”，并和郭沫若等主办《鹅血周刊》，宣传革命思想。他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央干部特别训练班，还担任过全国农民协会总秘书（相当现在的秘书长），并代理过主席职务。

后来鸿沉被调去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熊雄，同事有郭沫若、肖楚女、恽代英等。鸿沉除任课外，还负责主编军校出版的《黄埔日刊》，并为日刊撰写《日评》、《时评》专栏文章，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革命理论。在现在保存的实物资料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二月份《黄埔日刊》合订本中，署名鸿沉的《日评》共十五篇，其中如《英、美、日帝国主义对华态度是一致的么？》（二月十五日）、《张胡子也想当皇帝了！》①（二月十八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众都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二月二十八日）等，文笔犀利、立场鲜明。在二月二十五日题为《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之运动与援助上海百万革命群众的政治大罢工》一文中强调指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们！帝国主义在它死到临头的时候，越是凶暴残毒起来了。我们为要获得我们就要来到的胜利，我们只有牺牲一切，与帝国主义血战。……不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任何国家的人民，不论白种、黑种、黄种任何种族，都要认识我们唯一的敌人是资本主义

寡头专政的财阀——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以鸿沉署名的《编完以后的话》中说：“……数量在三万份以上，遍及全国和本世界的本刊，借此正可以作一个反帝大宣传，不怕人家说我们‘赤化军队’，‘赤化宣传’，……。”从以上部分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鸿沉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坚定立场。

一九二七年，鸿沉参加北伐，曾任“铁军”张发奎某部副师长。后调往武汉工作，不久，“宁汉分裂”，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指示他回川进行地下党活动。在回川途经宜昌时，因行李中的革命书报被反动当局查出，不幸被捕。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才于一九二九年三月获释。

一九二九年初夏，鸿沉回到重庆，与地下党负责人梁伯龙等取得联系，他们研究决定在四川以办学形式进行革命活动。为了掩护，鸿沉改名“张竟若”，他剃光头发，脱下西装，换穿长袍马褂，在梁伯龙主办的重庆高中担任《唯物史观》等课程。工作安排好以后，鸿沉回家探亲。此时我家已从县城搬回大观镇街上十八梯（父亲买下的一间街房）居住^②。那时我年满十三岁，已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正准备去重庆升学，鸿沉便将我带到重庆，插入重庆高中一年级。从此，我就随他在一起，朝夕相依，历经重庆高中、西南学院、西南大学三校，直到他为党捐躯，安葬锦官城外为止，这两年间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重庆高中的教学方针是政治与文化并重，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的革命人生观。课程除一般学科外，还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等。在重庆高中读书的学生，多是倾向进步，探求救国救民真谛以及反抗封建家庭而出走的男女青年，他们在学校的领导下，时常走上

街头搞宣传活动，张贴、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革命标语口号。当时，四川还处于军阀割据时代，统治重庆地区的军阀刘湘发觉了重庆高中的进步活动，一九二九年八月，他一纸通令把学校查封了。

重庆高中被查封后，全体师生在梁伯龙和鸿沉率领下转移到市郊开办西南学院，院址选在南岸南城坪胡家祠堂。学院由梁伯龙任院长，张竞若（鸿沉）任教务长，以祠堂正殿作办公室，两厢楼上楼下作教室，戏台左右改作教师宿舍，学生们则分散住在附近农家。学院分设文理两个专科，我们文科开设《文学概论》、《戏剧论》及美学、艺术等课，教材大都是新文学白话本，把同学们从古文中解放出来了。学院的办学经费是靠向社会开明人士筹募，所以教师们都是只供膳食，略有补助而已。由于重庆高中被封，激起各地有志青年的愤慨，因而有很多涪陵、万县、乐山、泸州等地的进步青年来学院就读，也有一些有理想、有大志的青年教师放弃高薪来学院过艰苦的教学生活。西南学院是党领导下的一所反帝、反封建的学校，当然更是封建统治阶级不能容忍的。因此，办起不到一学期，又被军阀刘湘以“宣传赤化”罪名查封了。

西南学院被封以后，梁伯龙和鸿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到成都办西南大学。学生们得知学院被查封消息，怀着愤怒的心情，纷纷涌向祠堂大殿，把梁院长和鸿沉包围起来，要求指引革命道路。梁院长安慰大家说：“学校还是要办的，我们已研究决定迁往成都办西南大学。不过去成都我们得步行，怕吃苦的，可以退学。”同学们齐声高呼“我们不怕苦！我们上成都！”群情激愤，声振屋瓦。那个热烈场面，实在太令人感动了。于是，师生们纷纷打点行装，作出发准

备。这时鸿沉写信回家，通知五姐淑宜来重庆一道去成都西大读书。淑宜得信即到重庆，从此，她承担起了我们兄弟俩的生活家务，鸿沉得以全力从事学院搬迁和建立西南大学的筹划工作。

一九二九年底，西南学院师生一二百人，在梁伯龙和鸿沉的率领下，背着行李，冒着刺骨寒风霜雪，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到达了成都。

一九三〇年春，西南大学在成都正式开学了。校本部设在城北楞静庵街，男生院在少城仁厚街，女生院在少城槐树街。西大聘请于右任为名誉校长，由梁伯龙任教务长，张竞若（鸿沉）任总务长，设文学系和政治经济系，课程有《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新文化概论》等。鸿沉主讲《政治经济学》，著名文学家杨邨人任文学系教授，其他教授除原西南学院的王映秋、曾继鲁等人外，又新增了詹云卿、曾泽炳和罗潜渊（南川大观镇人）、陈源希（南川福寿乡人）等。学生除原西南学院的外，川西各县又来了不少新生，全校师生达三四百人。我读文学系，淑宜读政治经济系。西南大学已成为当时西南地区宣传革命理论，组织进步青年开展革命运动的一所进步大学。

鸿沉、淑宜和我三兄妹与王映秋、罗潜渊两教授，共同租赁少城泡桐树街三号一所住宅作寓所。房东是诗礼之家，主客相处感情融洽。这里地处校本部和男女学生院中间，每天下午和星期日常有进步师生来此聚会，因此“泡桐树三号”逐渐成为西南大学进步势力的活动中心。

当时全国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攻下南昌、长沙、国民党政府惶惶万状。西南大学在成都配合革命形势，组织学生成

立“新兴剧社”，经常在少城公园广场宣传革命理论，公演《炭坑夫》（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暴动）、《黑暗里的红光》（农民反抗地主军阀）等话剧，出刊墙报，张贴标语等，以提高群众觉悟。这些活动，人都是在我们寓所聚齐，由鸿沉具体布置任务，分配人员，淑宜和我都是经常参加的人员之一。鸿沉又和梁伯龙创办了《西南日报》（后改名《锦江日报》）以扩大革命的宣传阵地，反帝反封建的怒潮高涨起来了。

革命运动的高涨，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当时统治成都地区的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个军阀，他们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实质上是成都地区的太上皇，和重庆的刘湘是一丘之貉。西南大学公开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竟然反到了太上皇头上，军阀们视之为洪水猛兽。一九三〇年六月，刘、邓、田三军阀为了镇压革命，成立了“三军联合督察处”，开展“清党”运动。成都宣布戒严，出动大批军警，捕杀革命群众，封闭革命学校、报刊。西南大学首当其冲被查封后，紧接着“民立”、“岷江”等校和《锦江日报》也被查封了。六月上旬，由于叛徒陈源希的告密，梁伯龙教务长被捕入狱，同时西大师生又有多人被捕。形势急转直下，党组织通知鸿沉：迅速转移，离蓉东下，刻不容缓！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晚，鸿沉、淑宜和王映秋、罗潜渊两教授在泡桐树三号寓所清理并销毁文件、书籍，准备撤退，彻夜未眠。十七日凌晨四点，鸿沉、王、罗三人，携带简单行李出走，谁知寓所已被军警包围，刚打开大门，军警一拥而入，当将三人逮捕，随即持枪入室，翻箱倒柜，大肆搜查，临行还要把我和淑宜带走，鸿沉说“这是房东的姐弟

俩，不要为难他们”。房东也来作证，才把我们放了。

梁伯龙、鸿沉被捕以后，情况更加恶化，大街小巷，军警林立，交通断绝，到处发生抄查捕杀事件。最令人发指眦裂而又哭哭不得的是，西大有位男同学因搜出一本《马氏交本》^③被指为宣传马列主义而逮捕；另有位女同学因携带一本红色封面小说，被斥为“宣传赤化”，女同学不服，据理力争，当场被刺死。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成都，街上关门闭户，人心惶惶，一片肃杀景象。

西南大学被查封和一些师生被捕以后，其余师生星散。房东主人怕受连累逼我们搬走，我和淑宜只好到处找同学家借住，成了东家一饭，西家一宿的流亡者，淑宜还要四处奔走拜托亲友设法营救亲人。鸿沉被捕三四天后，我们送衣被去“执法处”探监。监狱是一座庙宇式的已很破损的古建筑。探监送进带出的衣物、信件都要经过检查，双方交谈也有卫兵监视。我们见到鸿沉，非常难过，而他却谈笑自若，毫无颓丧之情，他还首先安慰我们说：“不要担心，不久就会出去的。”谁能料到，他再也出不来了。

从此以后，探望鸿沉大都由我单独去了，大约三四天一次。我不但给鸿沉送东西，有的师生家属也托我带一些衣物信件进出。可见，监里师生是与外界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系的。

一段时间以后，部份被捕师生的亲友花钱运动，因不是“要犯”，也渐渐有人被放出来了。组织上也在多方设法营救鸿沉等人，情况有所缓和。

是年八月，西大同学介绍淑宜去广汉第二小学任教，淑宜认为我们姐弟俩过那种流浪生活也非长策，就带着我去了。成都方面则请托张保权照料。保权是南川太平场人，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比我大两岁，在成都读省立师范，他常到

泡桐树三号来，已和我们认为本家兄弟，他为人忠诚可靠，把照料鸿沉的事托付给他是非常恰当的。广汉离成都只有几十里路，淑宜有时也去探望鸿沉。

十月间的一个深夜，广汉突然响起激烈枪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是夜，全城枪声不断。事后据说是驻军某部“叛变”，准备到成都去劫狱营救革命同志，因事机不密，未获成功。这就是有名的“汉州兵变”。

兵变发生后，成都军阀十分震怒，他们操起屠刀，开始血腥镇压。十月下旬，先将梁伯龙同志杀害。不久，噩耗传来，鸿沉四哥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三时被杀害于成都下莲池，年仅二十六岁（1904——1930）。

淑宜和我得保权急电，立即从广汉奔赴成都处理善后事宜。鸿沉就义后，军阀令陈尸刑场示众，并派军警看守，不准亲人认领。人们纷纷传说：“张某临刑不惧，高呼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淑宜和保权诡称同乡朋友，到外说情，几经周折，才将鸿沉遗体领回，淑宜用白绸将他裹了，由我们姐弟和亲友数人，于寒日西斜之时，迎着萧瑟秋风送去安葬在成都西门外茶店子姚家坟山。我不禁记起“何处青山骨可埋”诗句，想不到他的遗骨竟是埋在这里。

解放后，人民政府决定我家为革命烈士家属，父亲张树之为南川县政协委员。一九六〇年，父母去世，由政府安葬。鸿沉妻刘竹如，未生子女，于抗日战争中病逝。鸿沉的手稿、书信、照片等遗物均由我妥善保管，解放后，一部分由南川公安局取去，其余的因历次政治运动而失散，仅存的几张照片和两本《黄埔日刊》合订本，被重庆博物馆于一九八一年借去作革命文物展览，我手里只留有原件的复制品。

了。当年的西南大学教授、叛徒陈源希，在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已被人民政府镇压，得到他应得的可耻下场。

我从一九五〇年起，至今三十余年中，先后接待有关单位查访鸿沉革命事迹的人员二十余次，并写出他的事迹文稿多篇。一九五〇年，我写的《张竞若烈士简略生平》载于《重庆三三一惨案专刊》。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是鸿沉四哥殉难五十五周年纪念日。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应忘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在纪念他殉难五十五周年的前夕，我决定化悲痛为力量，在教学工作中，更加努力地培育年青一代。同时撰写这篇革命回忆录，把鸿沉那光辉灿烂的一生，忠实记录下来，教育子孙后代，学习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在四化建设中贡献力量，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

于南川三汇中学

注 释

①张胡子：指北洋军阀张作霖。

②大观镇街上十八梯街房至今尚存，已被南川县人民政府以《张竞若故居》命名为革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③《马氏文通》：清末马建忠著的一部讲述古汉语文法的书籍。

编者注

关于张鸿沉烈士一九二六年曾在广州担任全国农民协会总秘书，代理主席职务和北碚中担任张发奎部副师职务，正在查证中。

从五角红星所想到的

〔韦德厚〕

凡是路过合溪小学的行人，一眼就看到校门上嵌着一颗红光灿灿的五角星。她是四十年代合溪地下党人为纪念韦奚成而制作的。她在黑暗的岁月里经历了狂风暴雨的冲击。由于人易事迁，五角红星几度兴废，现在仍在校门上闪发着灿灿红光。

合溪小学校址在合溪场背面，是原来的禹王庙，前面是一条小溪，溪岸上是人行大路。解放前，德隆、元村两个乡，以及合溪乡的风门、郭家两个村的人赶合溪场，或去毗邻贵州省正安县都必须从校门外经过。人行路里边是学校围墙，校门在围墙中央，路旁密植杨柳，墙的两端有几颗二人合抱的大树。盛夏过此，绿树成荫，衬托着校门上的五角星，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行人看到五角星，无不肃然起敬。解放后，修建的从大有经合溪到贵州正安县新州的公路，是由学校的背面经过，所以，现在的校门已改为面向公路，与原来成了面背互换了。为了继承革命传统，校门上仍照原样做上了五角红星。

只要熟悉的人，一看到校门上的五角星，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合溪小学的创始人——革命烈士韦奚成。韦奚成一八九〇年出生于南川县合溪乡半边田一个小农家庭里，先后在本

乡和南川县城念书，一九〇六年入重庆府中学。当时，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世界大同的理想，韦奚成受到了极深的影响，特别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即卷入了拯救中国的革命洪流，于一九〇九年参加了“同盟会”。一九一〇年的暑、寒假，他两度被派遣回南川发展“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同人会”。后来他两次参加国民革命军熊克武部队，先后在刘伯承麾下任排长、连长、营长及警卫营长。

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革命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韦奚成在军队里受到共产党的教育，看到了真理，认识了拯救中华民族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彻底实现。他在大革命中经受了考验，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南川较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四川革命在朱德、刘伯承等的积极活动下，通过国民党左派熊克武和他的参谋长李蔚如（共产党员）等，利用其武装力量，作反对各派军阀的斗争。李蔚如举荐调郭汝栋（李的学生）驻防涪陵，计划夺取重庆南岸一带作为革命根据地，韦奚成一九二七年在南川参加了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郭汝栋为个人利益投靠刘湘，将李蔚如出卖，进行诱捕，被刘湘杀害。韦奚成在一九二四年一次反军阀的战斗中，负伤于忠县石院子，右膝至残。战争失败后，共产党为了保存力量，发展革命势力，指示韦转入地下斗争，被派到犍为、云阳等地以办团务、教书等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间长达八年，因被国民党政府和团阀发现，又转移回老家合溪乡，继续革命。

韦奚成两度在合溪以办学校掩护革命。第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在合溪场上以刘汉勋办的私塾的基础上，开办“育才小

学”，就是现在合溪乡完全小学的前身。当时有共产党员张茂昭（即谢德璋的化名）、李义、肖子洋等一起，以从教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除掉了大地主、大恶霸冯仲杰和副团总韦元章，推动了革命的进程。第二次是一九四〇年他在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后，由重庆南岸重伤医院回到合溪乡建立革命据点，党又派来共产党员温与咸（现名温凯廷、曾名温作民）、张琼英（女）等同志与他一道工作。经过上层工作，韦奚成任乡长，温与咸任副乡长，张琼英任教导主任，把当时合溪乡的政、教和党的革命事业合为一体。

学校还设有图书馆，陈列的多属韦奚成购买征集的革命进步书籍，供学生、革命者及合溪进步人士阅读。一九四二年韦奚成逝世后，命名“奚成图书馆”，留传至今，成了革命文物。

韦奚成的一生中，主要的革命活动除在刘伯承部参加反军阀的战争，在犍为、云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外，还要数一九二七年一月组织南川的武装暴动和一九二八年反勒派捐款的斗争最为突出。

一九二七年，南川党组织执行党夺取重庆南岸一带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决定，组织南川东、西、北路部分民团和农民，进行反对南路大团阀张茂春的武装起义，在组织攻打南川县城的斗争中，韦奚成不仅是十分活跃分子，而且是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当时，大军阀刘湘委任的南川县知事郝跃廷纠集张茂春的全部力量及刘湘的第三师来南抵御。南川大为震撼，全川受到影响。由于起义军中的一些人如王懋廷、赵海州等临阵妥协而失败。但是，这次起义，在南川人民中深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并进一步认识到，革命不可能没有